

doi: 10.16006/j.cnki.twnt.2018.02.003

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视角下乡村旅游对贫困农户生计的影响 ——以福建省永春县北溪村为例

蔡晶晶, 吴希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基于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视角, 将乡村旅游地视为局域性的社会—生态系统, 应用可持续生计框架对福建省永春县北溪村乡村旅游发展历程进行梳理, 分析旅游发展对农户生计的冲击及其所采取的适应性生计策略, 并定性评价农户生计资本及生计脆弱性。结果认为: ①乡村旅游改变了北溪村传统的生计方式, 农户生计资本总体改善, 但表现出明显的替代效应; ②旅游资源控制权的丧失使当地社会—生态系统暴露于旅游业固有的周期波动性所产生的外部冲击, 农户生计脆弱性上升; ③旅游对农户生计的胁迫大于机遇, 适应能力差异驱动农户生计结构异质化。乡村旅游对农户影响作用的发生有赖于农户对旅游产业发展的适应, 需要政府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和扶持措施增强农户对旅游扰动的适应力, 降低农户生计的脆弱性。

关键词: 乡村旅游; 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 农户适应力; 生计资本与策略; 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 F592.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37-5617 (2018) 02-0009-09

Effects of Rural Tourism on the Livelihood of Poor Farm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Ecosystem Vulnerability: A Case Study of Beixi Village, Yongchun County, Fujian Province

CAI Jing-jing, WU Xi

(School of Economic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vulnerability of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 and regarding the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 as the local social-ecological system,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rural tourism in Beixi Village, Yongchun County, Fujian Province, was reviewed with sustainable livelihood framework, the impact of tourism development on the livelihood of farmers and the adaptive livelihood strategies adopted were analyzed, and the livelihood capital and livelihood vulnerability of peasant households were qualitatively evaluated. The main conclusions included: ①the rural tourism had changed the traditional ways of farmers' livelihood in Beixi. The farmers' livelihood capital achieved improvement overall, but showed obvious substitution effect; ②Due to the control loss of tourism resources, the local social-ecological system were suffering the external shocks generated by the intrinsic cyclical fluctuation of tourism industry, and the vulnerability of farmers' livelihood had been increased; ③The impact of tourism on the farmers' livelihood contained more threat than opportunity, and the differences of farmers' adaptability induced the heterogeneity of the livelihood structures. Therefore the effects of rural tourism on farmers' livelihood depends on their adaptability, which needs the government to supply good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s and supporting measures to enhance the farmers' adaptability to the disturbance of tourism and to reduce the vulnerability of farmers' livelihood.

Key words: rural tourism; vulnerability of social-ecological system; farmers' adaptability; livelihood capital and strategie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贫困农户生计问题一直威胁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而空前繁荣的乡村旅游业在农户生计改善方面的积极作用逐渐受到学界和政界的广泛关注, 以“旅游促发展”的“旅游扶贫工程”进行得

如火如荼。然而, 我国农村贫困地区和生态脆弱地带在地理空间分布上的高度一致性使得旅游地本身成为一个复杂的社会—生态系统, 既有自然景观和人文历史风貌构成的资源系统, 亦有旅游者、管理

收稿日期: 2017-05-23

作者简介: 蔡晶晶 (1981-), 女, 副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 社会—生态系统分析、生态经济。E-mail: crystalgly@xmu.edu.cn

基金项目: 福建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 (2016R009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71774136);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 (17YJA630003); 中央高校基金 (20720181089)

者、当地农户、非营利组织等利益相关者组成的社会系统，夹杂着制度、文化、权力与组织等多方面因素，具有复杂性、动态性、不可预期性、自组织性等特征。乡村旅游开发通过改变乡村地区传统的农业种养结构，使乡村地区由农业主导向旅游业主导的发展阶段转变，在改善农户经济境况的同时，其固有的周期波动性却对当地的生态环境、社会文化、经济结构造成强烈扰动和冲击，降低了贫困农户的生计资本和适应能力，增加了当地社会—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对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和减贫工程的持续推进形成阻碍。如何在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背景下通过发展乡村旅游来充分保障农户权益、改善农户生计，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生计包括能力、资产，以及一种生活方式所需要的活动^[1]。可持续生计是指在能够处理压力并从压力中恢复，保持并提升其能力和资本的同时，而不破坏自然资源的基础。后继的研究进一步细化“生计资产”概念，并强调其在农户生计中的核心地位^[2]。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提出的可持续生计框架进一步整合了各生计要素，推动了贫困农户生计研究的规范化与系统化^[3]。由于结合了脆弱性分析和农户生计分析的优势，可持续生计框架被学界广泛应用于扶贫领域和贫困脆弱性研究^[4-7]，探讨风险分担网络^[8]、社会资本^[9-10]、社会保障体系^[10]、生态补偿^[11-12]等因素在抵御外部风险、改善生计和降低贫困脆弱性方面的积极作用。

脆弱性概念起源于生态领域自然灾害和气候变化研究^[13]。世界银行在《世界发展报告 2000/2001：与贫困作斗争》中指出，不安全（Insecurity）和脆弱性概念动态地描述了随时间推移人们针对变化所做出的响应。不安全是指暴露于风险之中，而脆弱性是指风险等外部冲击导致福利水平下降的可能性，即系统暴露于风险等外部冲击时遭受损害的可能性^[13-15]。政府间全球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认为，适应性、敏感性（Sensitivity）和暴露（Exposure）共同构成了脆弱性的概念框架^[16]。适应性强调系统或行为主体在面临扰动时，如何趋利避害，从而保持可持续性^[17]，是行为主体或行动者的行为过程或行为动态^[18]。调控适应性是系统改变暴露和敏感性进而降低脆弱性的关键。随着研究的深入，生态系统领域的脆弱性内涵逐渐拓展到社会—生态系统。社会—生态系统

（Social-Economic System, SESs）是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相互影响的复杂适应系统，受自身与外界的干扰和驱动，具有不可预期性、自组织性、复杂性、历史依赖、多稳态或体制（Regime）等特征，并具有强大的交互反馈能力^[19-21]，脆弱性、恢复力（Resilience）、适应性、稳健性（Robustness）是描述系统应对干扰能力的关键术语^[22-23]。

随着社会—生态系统研究热潮的兴起，脆弱性概念开始在贫困、可持续发展、生计保障和公共健康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24]，脆弱性被视作农户资产禀赋、保险机制以及遭受冲击程度和频度的函数。而乡村旅游的蓬勃发展进一步推动了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和农户可持续生计研究，这些文献对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的脆弱性概念做出了进一步的阐述、解释和修正。国内学者中，喻忠磊^[25]认为，乡村旅游使当地人—地互动愈趋强烈，旅游业内在脆弱性、旅游地生态与自然资源使用状况的改变、人文社会环境变迁等对农户传统生计构成胁迫，导致农户生计资本发生重大变化，加上旅游受益不均导致的社会矛盾激化，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的复杂性与脆弱性明显上升。陈佳等^[26]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从农户生计、旅游开发和社区发展的互动视角，借助 SESs 脆弱性指标评价法，分析了秦岭北麓旅游开发对农户生计的影响，发现农户生计方式变迁导致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增强。丁士军等^[27]在可持续生计框架基础上利用因子分析及因子综合得分方法，评价失地前后农户生计资本变化。杜书云等^[5]研究表明，土地权益缺损、再就业渠道过窄、社保体系覆盖缺失等内外部因素引致了失地农民群体的可持续生计困境，并因失地程度、户籍特征及城市融入差异呈现多样性。吴吉林等^[28]认为，农户适应乡村旅游发展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生态系统失调、政策推动和生计资本，理性是农户适应行为的内因，而传统观念和生计策略决定了适应结果。席建超等^[29]以可持续生计理论为基础对河北野三坡旅游区苟各庄村进行了研究，发现旅游使得农户生计模式发生分层和空间极化，并从生计资本、生计策略和生计结果三方面比较了旅游主导型生计模式和兼业型生计模式。

总体上讲，国外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研究先于国内，且国外学者注重 SESs 脆弱性理论、机制、分析框架的探讨和完善，而国内学者更多立足于国内扶贫和乡村旅游发展实践，结合可持续生计

框架进行脆弱性研究的本土化应用^[30]。尽管可持续生计概念在国内已被广泛接受,但当前国内研究集中于考察农户生计资本变动,从脆弱性视角探讨旅游地农户生计问题的成果较少^[26],并缺乏对农户生计脆弱性驱动因素的研究。多数研究缺乏对农户行为过程整体的审视,难以充分挖掘农户行为反应与目的地社会—生态系统之间的联系,研究视角缺乏整体性、动态性和过程性^[25],难以充分解释旅游发展对乡村旅游目的地社会—生态系统整体的影响,以及因这些影响而导致的农户生计变化过程与机制,因而难以有效地指导乡村旅游目的地农户应对乡村旅游的多重影响,趋利避害实现可持续发展。

本文将乡村旅游地视为局域性的社会—生态系统,将“乡村旅游”视为系统外部扰动,在梳理福建省永春县北溪村乡村旅游发展历程的基础上,结合实地调查、焦点团体访谈、参与观察等质性研究方法,应用可持续生计框架对农户生计状况进行定性研究和评价,并进一步探讨农户生计脆弱性及其驱动因素。超越“收入贫困”,本文从社区参与、利益相关者行动、权力治理、可行的发展能力等更深层次维度来分析解读乡村旅游对北溪村农户生计的冲击及农户的适应过程,是从脆弱性视角审视农户贫困问题的一次尝试,充实了社会—生态系统与适应性研究的案例实证,有助于加深对农村贫困和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驱动因素的理解,为农户适应和减贫手段的探索提供新的思路,在实践上更好地促进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和农户生计改善,推动我国未来的旅游扶贫实践。

1 福建省永春县北溪村乡村旅游发展历程

北溪村位于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岵山镇西南部,与南安市相邻,面积 3.4 km²,耕地 17.13 hm²,森林面积 306.4 hm²,主要种植龙眼和水稻。村落开门见山,一袭清泉镶嵌在村落中,漫山葱郁。村庄生态资源丰富,森林覆盖率达到 98%,交通便利,区位优势明显。现有人口 109 户,518 人,4 个村民小组。80%以上的村民外出务工,留守的基本为老人。“许”是北溪村大姓,村内无外地人常住,也没有少数民族。2011 年实现农民人均纯收入 9085 元。

2007 年,永春县政府通过招商引资引进北溪

文苑旅游开发公司对北溪村旅游资源进行开发,将北溪村“桃花谷”打造成集生态旅游、商务会议、休闲娱乐、度假购物为一体的综合性景区。北溪村充分利用“桃花谷”品牌,举办北溪桃花文化旅游节,并凭借三大自然生态景观瀑布与“北溪十二景”等自然景观,桃香湖大酒店、山景客房、各类球馆、游泳池、钓鱼台、画苑、藏金阁等旅游设施,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休闲度假。2013 年,北溪村被农业部评为“中国最有魅力休闲乡村”,为福建省首个获此殊荣的美丽乡村,北溪文苑自然风景区也获得福建省旅游局颁发的“四星级乡村旅游经营单位”荣誉称号。从 2003 年至今,北溪村乡村旅游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每个阶段都由不同的结构主体主导。乡村旅游发展潮流、大量不同地域与文化背景的游客的涌入和旅游业内在的季节性与周期波动构成了北溪村农户生计的脆弱性语境。

1.1 政府主导阶段(2003—2007 年)

2003 年以前,由于村里的耕地都在谷地、山坡,土质松软、土壤肥力不高,水稻、果树种植收成不好,加上交通不便,粮食、水果难以运出,大多数村民生计窘迫,纷纷放弃种地。而且,为让孩子有更好的受教育机会,解决“上学难”问题,部分家庭选择拖家带口常年在县里或者外地谋生,导致耕地抛荒,村里人烟寂寥。2003 年,北溪村开始新农村建设。为充分利用北溪村森林资源优势、发掘北溪村旅游潜力,永春县政府响应“新农村建设”号召,率先投入 1000 万资金打造“桃花谷”这一享誉省内的乡村旅游景点,修建入村公路和栈道,开发村内三大瀑布。“桃花谷”正式运营后,由岵山镇政府进行管理,向游客收取 5~10 元参观门票,门票收入全部纳入镇政府财政。在“桃花谷”建设过程中,政府采用产权置换方式将住在“桃花谷”内的部分村民(2 组和 3 组)迁出,并在其新房建设过程中补助 2/3。于是,北溪村村容村貌焕然一新,以往的破旧老屋换成了新屋,农户住房条件得到明显改善。同时,部分留守村民在政府鼓励下经营起了民宿和农家乐。在这一阶段,永春县政府这一结构主体顺应乡村旅游发展潮流,通过征用耕地、颁布“禁伐令”、门票收入归财政等政策措施形成了“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耕地被征用以及薄弱的权力意识导致农户逐渐丧失旅游资源控制权,在乡村旅游规划管理事务中开始被边缘化。同时,农户生计策略已开始从传统的务农策略

转向旅游务农兼营型策略,但旅游参与仅限于经营农家乐、民宿,表现出参与人数少、参与层次低、自发性和无组织性的特点。

1.2 公司主导阶段 (2007年—)

2007年,永春县政府通过招商引资引进北溪文苑旅游开发公司,并将“桃花谷”转让给该公司做进一步开发。一方面,镇政府、公司和村集体三方约定:景区建成营业后,门票收入的20%归镇政府,10%归村集体(村财),用于环境卫生、公共场所建设等。为满足公司旅游设施建设用地要求,镇政府出面向村民进行二次征地,并按相关标准进行一次性补偿。公司还承诺优先雇用北溪村村民。但从2007年公司进行项目考察到2009年旅游设施开工建设,从2011年景区试营业到2016年所有建设项目竣工,北溪村村民都没有参与到旅游项目规划、建设、运营管理、营销宣传中来,公司仅招了3个村民去给房屋装潢,另外还有10几个村民到公司打工(公司有150几名员工)，“优先雇用本村人”的承诺并没有实现。另一方面,游客的大量涌入让更多农户开始抓住机遇,参与到旅游经营当中,开农家乐、办民宿、养土鸡、卖蜂蜜。截至目前,共有11家农家乐和民宿。在发展旅游的过程中,县政府财政也对北溪村进行大力支持,以改善农户生产生活条件。北溪村建成了农家书屋、文化广场、文化宣传栏、棋牌休闲等村民活动娱乐场所。近几年,政府更是在北溪村投入大量资金建设停车场、环村路、栈道等路桥设施,铺设供水管

道、供电线路,架设路灯,完善通讯基站设施。同时拆旧建新,改造村民房屋斜顶坡面,建设北溪办公大楼和垃圾转运站。政府和公司也积极组织生态旅游服务技能与文明礼仪等各类培训,提升农户人力资本。

在这一阶段,永春县政府响应“美丽乡村建设”号召,通过招商引资引进北溪文苑旅游公司这一私人结构主体从而退出旅游经营,转而进行旅游配套设施建设,通过提供公共服务以扶持农户生计。自此,北溪村乡村旅游发展进入“公司主导”阶段。随着北溪文苑公司旅游设施建设与永春县政府配套项目的跟进,农户经营农家乐、民宿的鼓励政策日渐完善,北溪村农户生计环境明显改善。同时,为满足游客的多样化需求,农户(以旅游合作社的形式)和公司开始协商合作,共享客源,农户和公司开始走向共赢的局面,脆弱性语境发生有利的转变。

2 乡村旅游对北溪村农户生计影响分析

可持续生计框架由脆弱性语境、生计资本、结构和过程转型、生计策略和生计输出5部分组成,描述了农户在受制度和组织影响的脆弱性语境中,如何利用自身资源禀赋和外部支持,从外来冲击中恢复并提高生计资本获取能力以实现更好的生计输出的情形^[31]。该框架为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提供了指标来源,用于衡量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生计资本的变动(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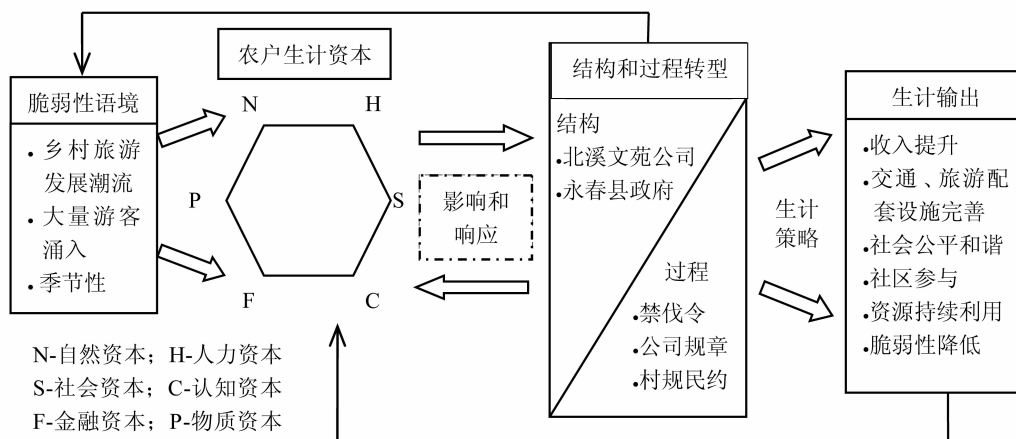


图1 可持续生计框架在北溪村乡村旅游发展中的应用

注: 数据由 DFID 的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Guidance Sheets^[31] 相关资料整理获得。

2.1 北溪村农户生计资本分析

(1) 生计资本：指发展的内生性要素，是生计分析的基础，是可持续生计框架的核心概念之一，指的是农户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所能获取的有形和无形资产。农户，特别是贫困户的生计资本积累水平越低，脆弱性越高。乡村旅游开发使得北溪村农户生计资本结构发生巨大变化，表现出明显的替代效应。虽然六类生计资本总体得到改善，但每一类生计资本的衡量指标都出现了正负向变化并存的情况，其中社会资本严重恶化。

(2) 自然资本：指自然为农户生计所提供的资源流和服务，包括无形的公共资本（大气、生物）和有形的生产资本（土地、树木）以及生态服务，一般地，农户生计对自然资本具有很高的依赖性，自然资本的贫富、变动会对农户生计造成冲击和不确定性。北溪村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始终坚持保护性开发原则，因地制宜布置旅游设施，垃圾集中处理，农户家畜全部圈养，村庄环境质量明显提高，水泥路的铺设使得村庄对外交通极为便利。乡村旅游的发展使得北溪村旅游资源优势被充分挖掘，丰富的森林资源、清冽的山泉、漫山遍野的桃花、完善的配套等使得北溪村成为真正的“宝地”，地理与资源优势大大改善。然而，耕地被征和森林禁伐使得北溪村农户的生计资源使用受到限制，人均耕地、林地大幅减少。

(3) 人力资本：指借以谋生的知识、技能、经验，以及劳动能力和健康状况，人力资本的加强，能使农户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更好地利用其他 5 类资本，实现更好的生计输出。在乡村发展过程中，永春县政府、北溪文苑旅游开发公司鼓励农户经营农家乐和民宿，并雇佣村民在公司打工，旅游从业人数明显上升，但参与面窄、参与层次低。虽然政府和公司积极组织农户参与生态旅游服务技能与文明礼仪培训，农户的技能培训机会明显增多，但旅游经营能力并未明显上升，人力资本未得到明显提高。同时，村里并没有学校，几乎所有农户子女都在外地寻求更好的受教育条件，旅游发展并没有使受教育条件得到改善，农户受教育程度依然偏低。

(4) 社会资本：指农户为了实施不同的生计策略而利用的社会资源，包括加入的各种社区组织，以及个人构建的社会网络，通常包括农户参与旅游合作社等情况，或是获得社会网络支持情

况，社会资本代表着公平、信任与合作，为农户生计提供强大保障。旅游开发占用大量耕地，导致农户常年外出务工以谋生计，仅有老人和未到入学年龄的小孩子留守，同村宗族亲友之间走动变少，这使得传统的宗族关系维持遭遇重大挑战，乡村“熟人社会”濒于瓦解，农户社会关系网变得更加薄弱。然而，“公司主导”的旅游发展模式决定了贫困农户无法参与到旅游项目规划建设、运营管理等一系列核心环节，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即便是经营农家乐和民宿的农户，也面临旅游收入差距拉大的情况，社区和谐正在消失。

(5) 认知资本：指农户对生计环境变化及其驱动因素的认识与态度，包括对乡村旅游扶持政策、制度的知晓度和对乡村旅游发展的态度。更好的认知，可使农户采取更科学合理的生计策略，实现预期的生计目标。为有效应对旅游淡旺季客流量不稳定所带来的冲击，北溪村 11 家农家乐、民宿自发成立合作社以整合餐饮、住宿资源，自组织管理意识明显提高。一方面，政府的环保宣传、旅游公司的培训和游客的关注使得农户生态保护意识明显上升，打扫环境卫生的自觉性提高。另一方面，虽然旅游发展确实使游客大幅增加，政府也鼓励农户参与旅游经营，村民也意识到其中存在的机遇，并很愿意参与乡村旅游，但与外出务工赚取的收入相比，“农家乐和民宿根本赚不了什么钱”。结果，年轻人依然不愿意回乡创业。

(6) 金融资本：指农户在旅游发展过程中为达到生计目标所需积累的流动资金，主要指农户可支配和可筹措的现金，通常包括自身的现金收入和乡村旅游支持贷款、接受的补助及无偿援助等，金融资本代表着农户从内外部获取资金的能力，是风险抵御能力的重要体现。为支持农户参与旅游经营，开办农家乐和民宿，政府给予财政补贴，银行也发放小额贷款，农户获得财政补贴和贷款的机会增加，但并没有非政府组织项目基金的支持。除了传统农业种植收入和务工收入，旅游经营确实也使得农户旅游收入增加，收入来源多元化明显改善，但未参与旅游经营的农户基本只能外出务工，收入来源单一。

(7) 物质资本：指除自然资本外，农户可用于日常生计的基本生产资料以及基础设施，包括旅游公共设施、家庭经营性资产和旅游中介机构数量，物质资本通过提高农户生产力以实现更好的生计输

出。北溪文苑旅游开发公司的进驻和县政府财政对配套项目的支持使得北溪村旅游公共设施基本完善,方便游客出行游玩。旅游组织数量也明显增多,除了北溪文苑公司和农家乐民宿合作社,旅行社等中介组织也纷至沓来。然而,只有参与旅游经营的农户,家庭经营性资产才更加丰富,包括农家乐置办桌椅板凳,民宿购置床铺、空调等。

2.2 农户生计脆弱性—适应力分析

农户生计资本代表着农户在面临外部冲击时的适应能力,适应能力越强,脆弱性越低。耕地征收和“禁伐令”的颁布使得北溪村农户的自然资本大幅减少(主要表现为人均耕地和林地等生产资产大幅减少),加上人力资本不足(农户受教育程度低)、社会资本薄弱(人口流失导致的乡村“熟人社会”瓦解)、认知资本缺乏(没有充分认识到乡村旅游发展潜力)、金融与物质资本积累受限(缺乏融资与收入多元化渠道、家庭经营性资产薄弱),乡村旅游开发使得北溪村农户本已薄弱的生计资本雪上加霜。为谋求生计,大量失地农户采用了“外出务工型”生计策略。与传统的农业种养殖生计策略相比,这部分外出务工农户的收入得到提高,生计输出得到明显改善。

与此同时,民生问题越来越受到永春县政府的关注。一方面,公路等基础设施的完善、保卫岗亭的设置、生态保护政策的宣传影响了农户生计资本(公共资本明显改善,包括交通、区位优势 and 村庄环境质量),并显著改变了留守农户的生计输出。当前,留守农户分为两类:不参与旅游经营的农户和经营农家乐、民宿的农户。前者大多是家庭贫困、精力不济的老年人,仅靠子女的赡养以维持生计。后者的留守农户抓住乡村旅游发展机遇,借助政策支持,选择了“旅游经营型”生计策略,并实现了旅游收入的提高,金融资本和物质资本得到改善。然而,面临游客量的大幅波动,“旅游经营型”生计策略实质上已经变成了“务工兼营旅游型”生计策略,经营农家乐和民宿并没有成为这部分留守农户的主要生计方式。成立农家乐的初衷也仅仅是想找点生计,收入也没有达到预期。且即便同是经营农家乐,旅游经营收入差距也在扩大。另一方面,农户认知资本得到明显改善。越来越多农户意识到乡村旅游发展所带来的机遇,参与旅游的积极性很高。为有效缓解旅游业淡旺季游客量不稳定性所带来的冲击,北溪村11家农家乐、民宿在村主

任的带领下成立了一个旅游合作社,农户认知资本进一步改善(表现为自组织管理意识提高)。另外,为了吸引游客到村里游玩,村委会正寻求与公司展开进一步合作,将村内的小溪开发成漂流项目,使更多农户参与进来,以期改善农户社会资本、农户生计输出与适应能力状况。

虽然乡村旅游开发确实大大改善了北溪村落后的面貌,但北溪村农户生计的脆弱性语境却发生了令人忧虑的变化:

(1) 农户在旅游发展规划管理和村级公共事务中逐步丧失话语权,成为北溪文苑旅游公司的附庸,日益暴露于乡村旅游所产生的外部冲击。二次征地导致农户耕地大幅减少,丧失几乎全部的旅游资源控制权,而政府“配合公司做些民事、让公司完全市场化运作”的放任态度进一步恶化了这种权力不平衡的形势,导致农户难以尽快适应乡村旅游开发所形成的脆弱性语境,旅游接待能力长期得不到提升,而在面对淡旺季客流量大幅波动的情形时显得有些“手足无措”。

(2) 旅游开发使得农户的耕地基本被占用,传统的农耕生计方式逐步瓦解。传统上,耕地一直是农户最为重要的生计资产。面对乡村旅游发展潮流,传统农耕逐步让位于旅游产业开发,耕地用途发生实质性转变,并具有不可逆性。但旅游并没有发挥足够的推动作用,北溪村大多数农户依然偏好外出务工的生计策略。

(3) 人口流失使得农村“熟人社会”出现瓦解迹象,恶化了农户的社会关系网络。在北溪村,许是大姓,同宗同族的血脉关系使得农户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然而,乡村旅游开发刺激了村里劳动力的外出,亲族之间走动大幅减少,久而久之,情感联系逐渐淡薄,“互帮互助”的基础日益薄弱,生计保障网趋于脆弱。

(4) 旅游业自身的脆弱性渗透进农户的日常生活,农户生计资本面临的风险增加。北溪文苑旅游公司的进驻,使得北溪村旅游发展进入“市场化运营”阶段,而农户成为市场风险的直接承受者之一。淡旺季客流量的波动、游客对旅游资源的破坏等因素使得农户生计资本具有极大的波动性和风险性,生计脆弱性越发明显。

3 讨论

乡村旅游发展使案例村农户生计环境发生深刻

变迁：农村传统种养殖经济结构因城镇化和劳动力流失逐渐走向衰落，这为旅游业的引入提供了可能性，而各类结构主体对农村发展新道路的探索让乡村旅游逐渐兴起并成为当地的重要产业；宏观经济增长所释放的旅游消费需求对结构与过程形成触动，政策引导及营销宣传吸引大批游客涌入，逐渐打破传统乡村“与世隔绝”的社会—生态系统，对当地资源系统、社会关系网络和治理体系产生全方位冲击；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推动了季节性、周期波动性对乡村社会—生态系统的进一步渗透，脆弱性逐渐成为系统最主要的特征。总而言之，乡村旅游发展潮流、大量游客涌入所带来的经济社会冲击和旅游业内在的季节性与周期波动构成了案例村农户生计的脆弱性语境。

政府，特别是县市级政府这一结构主体在乡村旅游发展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政府带头探索农村发展新道路，调整产业与农村扶持政策，使旅游业接下“乡村振兴”的大旗。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一方面，政府非常重视环境保护和土地利用：加强生态文明建设，颁布“禁伐令”以限制农户对森林的砍伐，培养农户的环保和可持续发展意识；加强耕地保护，建立严格的土地使用制度，对耕地转宅基地、商业用地、扩建房屋等行为进行层层申报审批以实现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另一方面，政府不断加大对乡村旅游的支持力度和民生的关注度：通过“美丽乡村建设”扶持政策，对乡村环境综合整治和游玩项目开发进行财政补助，不断完善旅游配套设施，并借助政府网站等公共平台进行宣传；完善农户生产生活设施，如新建/扩建对外交通/宅间道路、改造公共照明、供电供水系统；加强农业产业、旅游服务技能礼仪培训，引导农户了解旅游、参与旅游。然而，如果政府处理不好“支持”与“激发社区活力”的关系，就会剥夺社区的旅游发展话语权，进而使农户产生依赖心理，不利于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在北溪村，政府强势介入，旅游公司享有旅游资源开发经营管理权，未在各个重要环节充分吸收农户参与，导致参与的低层次性和发展的依赖性。

旅游业的引入对乡村社会—生态系统形成全方位冲击。为适应乡村旅游蓬勃发展的新业态和不断变化的脆弱性语境，农户纷纷调整家庭生计策略以实现一定的生计目标，这是农户生计资本存量与生存理性综合作用的结果。实地调查发现：耕地、山

林等物质性自然资本在传统农业种养殖生计中占有核心地位，而“土地景观化”显著减少了农户所拥有（经营使用权）的耕地、山林面积，进而对农户传统生计构成胁迫；农户参与旅游的生计策略不仅取决于生计资本存量，而且受村庄治理体系、社会网络、地理区位的影响；是否参与旅游对农户生计资本有显著影响，即旅游经营户的生计资本水平明显高于传统生计型家庭；乡村旅游发展改善了村庄公共设施，实现了收入上升（旅游参与户表现最为明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双重目标，但对“参与旅游”这一生计方式的过度依赖明显提高了农户的生计脆弱性。

4 结论

本文将案例地视为局域性的社会—生态系统，把农户视为乡村社会—生态系统的—个元素，把旅游视为乡村社会—生态系统的—外部扰动因素，将社会—生态系统的—变迁理解为旅游对目的地的—多重影响和目的地社会—生态系统—主动适应的结果；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结合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理论对北溪村乡村旅游发展效益进行评价。研究发现，乡村旅游发展确实使北溪村环境卫生、道路交通、住房条件、供水供电通讯设施等得到改善，村民对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也有—更深刻的认识和—更积极的态度。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如农户对—旅游资源的—控制权被“剥夺”、—旅游经营—受益并不明显、—农户生计—资本风险—增加。即—乡村旅游—发展使—北溪村—农户—生计—资本—表现出—明显的—替代效应，—总体—改善，—却—更具—脆弱性。—具体—包括—以下几个—基本—结论：

(1) 乡村旅游发展对目的地的社会—生态系统造成积极和消极的多重影响。尽管改善了农户社会—生态系统中的金融资本（收入来源多元化、政府补贴等）、物质资本（房屋、基础设施等）和自然资本（村容村貌），但对农户的金融资本（旅游收入不稳定）、社会资本（社会矛盾加大，人际和谐度降低，旅游发展权被剥夺）和人力资本（劳动力流失）等造成胁迫。总体来看，旅游对乡村社会—生态系统的胁迫性影响大于机遇性影响，相对于旅游发展前，乡村社会—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增强。在旅游发展征地过程中，应坚持适度原则，减轻对农户生计策略转变的胁迫，本着公平、公开、公正的征地补偿制度理念，对失地农户进行合理补偿，并确保其土地增值收益权；引导农户个体的自组织建

设,鼓励党员、社区精英带头成立协会/合作社等农户互助组织,通过抱团发展,从被动适应转为主动配置自身资源以降低生计脆弱度;尊重当地农户的主体地位和生计诉求,为农户参与旅游规划、建设、运营、管理、营销等核心环节扫除障碍,以制度供给保证农户对社区公共事务的主导权。

(2)为适应旅游对目的地的外部扰动,农户等利益主体的生计结构发生了改变:农户兼业现象普遍,外出务工兼营旅游业,纯粹以务农为收入来源的农户比例不到调研户数的20%,导致农业生产的重要性降低,但这同时也促进了乡村价值的发现与提升。农户的适应能力表现为融合了农业服务业、农业旅游业和休闲业等的农业新型的兼业形态。兼业现象多元化也说明了农户的适应能力有差异,导致不同的适应结果。农户对旅游扰动的适应力与其物质资本(房屋、耕地面积)、人力资本(家庭劳动力数、户主受教育水平)、社会资本(邻里关系)、认知资本(对发展机遇的认知)和地理区位因子(耕地和房屋位置)等因素有关。那些房屋面积较大、处于景区中心要道、家里有足够的劳力管理、社会资源较为丰富的农户,能够迅速捕捉到乡村旅游发展带来的商机,经营农家乐、民宿、搞农事体验和采摘等旅游项目,能较好地适应乡村生计环境的转变,因势利导扩大自身收入来源,降低耕地被征遭受的损失。这是在农户生计资产的利益分配权逐渐上收至政府和旅游公司的背景下,农户为适应旅游带来的机遇与风险,维持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进行了趋利避害的选择结果。

(3)旅游发展对北溪村农户影响作用的发生有赖于农户对旅游发展的适应能力,其内在机理是:农户在传统农业衰退与旅游业兴起情境下的社会理性选择。由于金融与物质资本积累受限(缺乏融资与收入多元化渠道、家庭经营性资产薄弱),乡村旅游开发使得北溪村农户本已薄弱的生计资本雪上加霜。为谋求生计,大量失地农户采用了“外出务工型”生计策略。与这部分农户相比,“旅游经营型”农户为了降低旅游季节性客流和旅游公司市场化运营的风险,仍然以务工为主,旅游为辅,同时积极成立旅游合作社加强与旅游公司的合作来合理分摊和抵御风险。农户积极性、社会资本及机遇认知是影响其适应力的重要因素。乡村旅游促进了乡村与城市的互动,城市的经营理念、投资方式与合作策略等渗入乡村的关节中,为理性的行为主体提

供了多元化的生计策略选择。

为持续改善农户生计,降低生计脆弱性,政府一方面应起到引导作用,帮助提高农户的抗风险能力,另一方面,通过赋权予能提升农户自组织的综合实力,增强农民在旅游资源收益、分配、谈判等方面的话语权和能力,进一步积累生计资本,促进可持续生计能力的提升:

在初始的政府主导阶段,应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增强农户对旅游扰动的适应力。政府在旅游发展征地过程中,应本着公平、公正、合理的设计理念,为农户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如主动公开土地征收补偿标准,土地收益分配方案,设立专门的监督部门,确保失地农民分配到应得的、合理的土地补偿;在政府、农民、企业之间合理分配土地增值收益,在村民代表大会上予以公示,接受社会的监督;加强对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建设,建立更高覆盖面、平等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农户生计抗风险水平,降低生计脆弱性;鼓励旅游公司和当地社区开展密切的沟通与合作,对旅游资源进行战略性保护开发,增强生态系统的恢复力;对村干部进行适当培训,提高村干部对乡村公共事务的管理能力,激发其主观能动性,鼓励其在乡村旅游发展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凝聚社区共识,引导农户积极参与旅游和回乡创业以改善社会资本,带领农户实现更好的生计输出。其次,为农户提供及时的旅游市场需求信息、有针对性的旅游从业培训和技术指导,如烹饪、驾驶和花卉果园种植,提高农户认知资本和人力资本,培育农户风险意识,降低农户生计脆弱性。

在后期成熟阶段,政府应以扶持的方式,引导农户个体的自组织建设,鼓励贫困户从被动应对乡村旅游业风险冲击转向主动配置自身的资源来抵御风险侵袭,以利益为导向,激发农户旅游参与的积极性,通过农民参与和互助的形式实现生计资本的积累。如出台相应的税收优惠、搭建农村金融信贷的绿色通道,鼓励发展农村淘宝销售土特产、在线农家乐和旅游项目的宣传与经营,规范民宿行业卫生、收费标准等,扶持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帮助农户建立旅游经营的可行发展能力,改变现有的生计困境。

总体而言,政府不仅要做好乡村旅游配套设施建设以改善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提供培训以改善人力资本、鼓励参与和返乡创业以改善社会资本、加强政策宣传和政策执行透明度以改善认知资本、

拓展金融财政渠道扶持以改善金融资本,而且要通过一系列的政策和制度安排支持农户在旅游发展中取得旅游资源的控制权和收益索取权,真正参与到旅游项目规划、开发建设、运营管理、营销宣传等活动中。

参考文献:

- [1] CARNEY D. Implementing a Sustainable Livelihood Approach [M]. London: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1998: 52—69.
- [2] ELLIS-JONES J, MASON T. Livelihood Strategies and Assets of Small Farmers in the Evaluation of Soil and Water Management Practices in the Temperate Inter-Andean Valleys of Bolivia [J]. Mounta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1999, 19 (3): 221—234.
- [3]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Guidance Sheets [EB/OL]. (1999—02—01). <http://www.enonline.net/resources/667>.
- [4] 张钦, 赵雪雁, 王亚茹, 等. 气候变化对农户生计的影响研究综述 [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6, 9 (37): 71—79.
- [5] 杜书云, 徐景霞. 内源式发展视角下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困境及破解机制研究 [J]. 经济学家, 2016 (7): 76—83.
- [6] 宋璐, 李树苗. 子女迁移对农村老年家庭生计资本的影响——基于家庭结构的可持续生计分析 [J]. 人口研究, 2017, 3 (41): 65—75.
- [7] 何仁伟, 李光勤, 刘运伟, 等. 基于可持续生计的精准扶贫分析方法及应用研究——以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为例 [J]. 地理科学进展, 2017, 36 (2): 182—192.
- [8] BRAMOULLE Y, KRANTON R. Risk-Sharing Networks [J].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2007, 64 (3): 275—294.
- [9] 王子乔, 石育中, 杨新军, 等. 外部社会资本视角下的黄土高原农户生活满意度研究——以陕西省长武县洪家镇为例 [J]. 干旱区地理, 2017, 6 (40): 1317—1327.
- [10] 杨文, 孙蚌珠, 王学龙. 中国农村家庭脆弱性的测量与分解 [J]. 经济研究, 2012 (4): 40—51.
- [11] 袁梁, 张光强, 霍学喜. 生态补偿、生计资本对居民可持续生计影响研究——以陕西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为例 [J]. 经济地理, 2017, 10 (37): 188—196.
- [12] 赵雪雁, 张丽, 江进德, 等. 生态补偿对农户生计的影响——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 [J]. 地理研究, 2013, 32 (3): 531—542.
- [13] DOW K. Exploring differences in our common future: The meaning of vulnerability to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J]. Geoforum, 1992, 23 (3): 417—436.
- [14] TURNER II B L, KASPERSON R E, MATSON P A, et al. A Framework for Vulnerability Analysis in Sustainability Science [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003, 100 (14): 8074—8079.
- [15] World Bank Development Report 2000/2001 [R]. Washington, D. C.: World Bank, 2001.
- [16] ADGER W N. Scales of governance and environmental justice for adaptation and mitigation of climate change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01, 13 (7): 921—931.
- [17] ADGER W N, ARNEL N W, TOMPKINS E L. Successful adaptation to climate change across scales [J].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005, 15 (2): 77—86.
- [18] SMIT B, WANDEL J. Adaptation, adaptive capacity and vulnerability [J].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006, 16 (3): 282—292.
- [19] GUMMING G S, BARNES G, PERZ S. An exploratory framework for the empirical measurement of resilience [J]. Ecosystems, 2005, 8 (8): 975—987.
- [20] GUNDERSON L H, HOLLING C S. Panarchy: Understanding transformation in human and natural systems [M]. Washington D. C.: Island Press, 2002.
- [21] GUNDERSON L H, KINZIG A, QUINLAN A, et al. Assessing resilience in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 workbook for scientists [R]. Resilience Alliance, 2007.
- [22] GALLOPIN G. Linkages between vulnerability, resilience, and adaptive capacity [J].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006 (16): 293—303.
- [23] JANSSEN M, OSTROM E. Resilience, vulnerability, and adaptation: A cross-cutting theme of the International Human Dimensions Programmed on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J].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006 (16), 237—239.
- [24] FÜSSEL H M. Vulnerability: A Generally Applicable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J].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007, 17 (2): 155—167.
- [25] 喻忠磊, 杨新军, 杨涛. 乡村农户适应旅游发展的模式及影响机制——以秦岭金丝峡景区为例 [J]. 地理学报, 2013, 68 (8): 1143—1156.
- [26] 陈佳, 杨新军, 王子乔, 等. 乡村旅游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及影响机理——基于秦岭景区农户调查数据的分析 [J]. 旅游学刊, 2015, 30 (3): 64—75.
- [27] 丁士军, 张银银, 马志雄. 被征地农户生计能力变化研究——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的改进 [J]. 农业经济问题, 2016 (6): 25—34.
- [28] 吴吉林, 刘水良, 周春山. 乡村旅游发展背景下传统村落农户适应性研究——以张家界4个村为例 [J]. 经济地理, 2017, 37 (12): 232—240.
- [29] 席建超, 张楠. 乡村旅游聚落农户生计模式演化研究——野三坡旅游区苟各庄村案例实证 [J]. 旅游学刊, 2016, 31 (7): 65—75.
- [30] 何仁伟, 李光勤, 刘邵权, 等. 可持续生计视角下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研究综述 [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7, 11 (27): 69—85.
- [31] CHAMBERS R, CONWAY G R. Sustainable rural livelihoods: practical concepts for the 21st century [R]. UK: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1992.